

中国史记研究会丛书

丛书主编 张大可

安平秋

俞樟华



史記研究集成



第十三卷 张新科 俞樟华 等著

史记研究史及
史记研究家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史记研究史及史记研究家/张新科, 俞樟华等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5.1

(史记研究集成: 13/张大可 安平秋 俞樟华 主编)

ISBN 7 - 5075 - 1565 - 6

I. 史… II. ①张…②俞… III. 史记—研究—历史
IV. 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61925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800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网址: <http://www.hwbs.com.cn>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bs@263.net

电话 (010) 83086663 (010) 83086853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通州区京华印刷制版厂印刷

880 × 1230 1/32 开本 246.75 印张 4958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定价: 990.00 元 (全套精装 1—14 册)

内 容 提 要

本书《史记研究集成》第十三卷《史记研究史及史记研究家》。本书分为上、中、下三编组成。上编“史记研究史”，原题《史记研究史略》，已于1989年由陕西三秦出版社出版，亦是本书的重点。《史记》问世两千多年，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内容既多且杂，又十分分散。本书“研究史”从众多资料中爬罗剔剔，披沙拣金，勾勒了“史记”研究的发展历史，把握各个时期的不同特点，突出重点，很有创意。中编评介了《史记》在海外的流传，重点是介绍在日本的研究与影响。下编是历代《史记》研究家的简略介绍。本书义理、考据、论述俱佳，颇具高度的概括能力，一书在手，可粗知《史记》流传两千年来古今中外的大略，是一部难得的资料书与工具书。

作 者 简 介

本书主创作者两位，张新科、俞樟华。张新科，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史记学概论》；俞樟华，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史记》论著有《史记新探》、《史记艺术论》等。本书参编作者：杨海崢、徐南元、藤田胜久、孙文阁。杨海崢，上编第二章作者，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著有《汉唐史记研究论稿》；徐南元，上编第六章第一节作者，韩国人，留学北京大学中文系，2002年文学博士；藤田胜久，中编第二章作者，日本爱媛大学教授；孙文阁，中编第二章翻译作者，河北师范大学副教授。

(155) 同举门一与同举班固 二
 (161) 篇责而究得《史记》核升元 三

目 录

(161) 果而而丰的究得《史记》升新 章六第
 (172) 新得究得《史记》入新 一
 (179) 新得究得《史记》入新 二
 (181) 新得究得《史记》入新 三

上编 史记研究史

第一章 《史记》在汉魏六朝时的传播和初步研究 (3)

 一、传播《史记》 (4)

 二、补、续、辨、注《史记》 (11)

 三、总评《史记》 (16)

第二章 汉代的学术大家对《史记》的评论 (24)

 一、扬雄对《史记》的评论 (24)

 二、王充的评论 (35)

 三、班氏父子对《史记》的评论 (53)

第三章 唐代奠定了《史记》在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 (77)

 一、《史记》三家注 (79)

 二、论《史记》的编纂体例 (85)

 三、韩、柳对《史记》研究的贡献 (100)

第四章 宋代开《史记》评论的风气 (108)

 一、始开评论《史记》的风气 (112)

二、马班异同成一门学问·····	(122)
三、元代对《史记》研究的贡献·····	(131)
第五章 明人评点《史记》的杰出成就·····	(136)
一、评点《史记》的杰出成就·····	(139)
二、对《史记》与小说关系的认识·····	(154)
三、其他成就略论·····	(163)
第六章 清代《史记》研究的丰硕成果·····	(168)
一、清人《史记》研究概说·····	(172)
二、乾嘉学派考证《史记》的硕果·····	(179)
三、《史记》评论方面的主要成就·····	(191)
四、桐城派等对《史记》艺术美的研究·····	(200)
第七章 清末至建国前的《史记》研究·····	(213)
一、考证方面的新成果·····	(215)
二、评论方面的新收获·····	(225)
第八章 建国以来《史记》研究的新发展·····	(235)
一、初见成效期·····	(236)
二、逐步深入期·····	(250)
三、硕果丰收期·····	(261)
中编 史记在海外的流传	
第一章 概说·····	(307)
一、基本情况·····	(307)
二、研究概述·····	(313)

第二章 日本对《史记》的传承与研究	(322)
一、引 言	(322)
二、《史记》传来前的状况	(325)
三、《史记》的传来和古抄本	(338)
四、镰仓、室町时代对《史记》的吸纳和融合	(351)
五、江户时期《史记》的吸纳和研究	(358)
六、明治以后的《史记》研究	(365)
七、战后日本的《史记》研究	(376)
八、司马迁的思想	(384)
九、结束语	(391)

下编 历代史记研究家

一、汉魏六朝	(397)
二、隋唐五代	(410)
三、宋 代	(416)
四、元 代	(436)
五、明 代	(445)
六、清 代	(478)
七、近现代与当代	(525)

【说明】本编“史记研究史”，原题《史记研究史略》，张新科、俞樟华著，陕西三秦出版社1990年出版。该书系统而准确地评述了历代《史记》研究者所取得的成就，汉魏六朝的传播与唐人的注疏，宋代开评论之风，元代的戏曲宣传，明人的点评，清代的考据，近现代的发展与丰收，有述有评，观点明确，重点突出，点面结合，具有时代特色，勾勒了“史记学”的发展历程，填补了一项学术空白。这次收入“史记研究集成”第十三卷，采入了杨海崢、徐南元两人著作中关于汉代学者的评析，以及清人成就概述，内容更为丰富，题名“史记研究史”为本卷上编。

第一章 《史记》在汉魏六朝时的传播和初步研究

汉魏六朝时期，是《史记》的传播和初步研究时期。受时代潮流的冲击，本时期的《史记》研究处在艰难的跋涉之中。当司马迁《史记》完成之日，正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确立之时，以至于整个两汉时期，儒家思想都是占据统治地位，各种异端思想销声匿迹，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局面不见了，就连汉初那种比较自由的学术气氛也荡然无存。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一次重大转变，这种定儒家思想于一尊的做法，无疑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史记》既是大一统社会的产物，又是这个大一统社会所不容的“谤书”，因为它敢于冲出为尊者讳的藩篱，把如椽之笔伸向统治阶级内部，揭露其丑恶行径，甚至把至高无上的皇帝头上的神圣光圈剔除干净。又由于它敢于把热情洋溢的笔墨付诸下层人物，对刺客、游侠表示极大的同情，敢于向儒家罕言之“利”挑战，表现出卓越的经济思想。所以，在正统思想家眼里，《史记》又成了叛经离道之作。从另一方面看，当时的文人学士，舞文弄墨，喜欢的是铺张扬厉、对偶工整、语言华丽的辞赋，而司马迁的《史记》则是用一种自由奔放、参差不齐的散体长短句与世相争。这就决定了它在当时文化氛围中的命运，正如司马贞所叹：“《史记》比于班书，微为古质，故汉晋名贤未知见重，所以魏文侯听古乐则唯恐卧，良有以也。”（《史记索隐序》）又说：“其人好奇而词省，故事核而文微，是以后之

学者多所未究。”（《史记索隐后序》）同时，史学在两汉时期还没有它应有的独立的地位，它被作为经学的附庸而列入《春秋》类中。这几股势力的融合，使《史记》的流布和研究都很难迈开大步。

魏晋以后，强大的思想解放潮流冲击着儒家的传统思想，人们从禁锢中解放出来，在新的文化氛围中，人们的认识、思想都有了新的特色。与此同时，学术上的一大变化就是：史学摆脱了经学附庸地位，在学术领域内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西晋秘书监荀勖《中经新簿》把史学从经学的附庸中划分出来，列为丙部，体现出史学的独立性。东晋著作郎李充《晋元帝书目》又把史部提升到仅次于经学的地位。史学本身也取得了巨大成就，数量繁多，甚至出现了“一代之史，至数十家”的局面。人们对史学认识的提高，尤其是“正史”地位之尊，也使《史记》的身价得到相应的提高。尽管《史记》有时也被视为洪水猛兽，但更多的人是站在赞同的立场上去评价《史记》，一反过去“尊班抑马”而为“尊马抑班”，并有人仔细研读，乃至出现了《史记集解》这样的著作，为后代的研究开了一个先河。从另一个方面看，文学和史学原为一家，这时开始分道扬镳。因此，相对而言，《史记》身价的提高只是从史学方面得到了提高，而它在文学上的成就还很少有人问津。

总之，汉魏六朝时期，是《史记》研究的开创阶段，专门研究《史记》的著作极少，大都是些片言只语，零星段落。现把这些材料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传播《史记》

从司马迁《报任安书》来看，《史记》在司马迁死前已经基本完成，篇目与我们今天所见大体相同。《太史公自序》说，当时《史记》有两本，“藏之名山，副在京师”。所谓名山者，即是藏之于家；京师者，即是皇家的图书馆（参陈直《汉晋人对史记的传播及其评价》）。司马迁死后，《史记》并没有公之于众，直到汉宣帝时，司马迁外孙平

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汉书·司马迁传》）。又《汉书·杨敞传》附《杨恽传》云：“恽母司马迁女也，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由此看来，司马迁死后，《史记》的正本当传到杨敞家中。杨恽当是《史记》的第一个传播者。《史记》的副本在当时已又有副本，司马迁所写副本，可能在汉末王莽之乱中被毁。

《史记》在东汉中期以前还未得到广泛的流传，它受到统治者的嫉恨与敌视。《西京杂记》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恨，削而去之”。班固《典引》记载汉明帝曾说：“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因此，统治者千方百计阻挠《史记》的传播。除皇家图书馆人员外，要想看到《史记》必须得到最高统治者的允许。《汉书·东平思王传》记载，宣帝的儿子刘宇多次遭贬，郁郁不得志，在成帝初年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结果，“天子如凤言，遂不与。”王凤之言不过是掩饰之词，实乃是害怕《史记》那种大胆的批判精神会助长受贬王子对朝廷的不满，危及他们的统治政权。

东汉中期以后，《史记》才在社会上得到了比较广泛的传播流行。尽管仍有人视之如洪水猛兽，如司徒王允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后汉书·蔡邕传》）魏明帝说：“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非贬孝武，令人切齿”（《三国志·王肃传》），但没有能阻挡住《史记》的流布，《史记》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承认。东汉桓灵时代，《太史公书》已正式称为《史记》，《执金吾丞武荣碑》（桓帝时）、《东海庙碑》（灵帝时）、《荡阴令张迁碑》（灵帝时）中都提到《史记》一书。这一名称的改变，反映了人们对《史记》评价的改变。正如清人梁玉绳所言：“取古史记之名以名迁之书，尊之也。”（《史记志疑》）这时候人们读到《史记》，已不是很难的事了。《三国志·吕蒙传》注引《江表传》记载孙权对吕蒙的谈话：“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裨益”，并劝吕蒙“宜急读《孙子》、《六韬》、

《左传》、《国语》及三史”。“三史”是指《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三国志·孟光传》说孟光“尤锐意三史”。《晋书·刘耽传》说刘耽“明习诗、礼、三史”。《魏书·阚骞传》说阚骞“三史群言，经目则诵”。《梁书·曹景宗传》说“曹景宗字子震，……颇爱史书，每读穰苴、乐毅传，辄放卷叹息曰：丈夫当如是！”《隋书·李密传》：李密师事包恺，“受《史记》、《汉书》，励精忘倦，恺门徒皆出其下。”这与前期的情况大不一样。不仅如此，《史记》在这时也传到了国外。李延寿《北史·高丽传》记载，高丽“书有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可见唐以前三史已传到高丽。《旧唐书·高丽传》也有类似记载。

汉魏六朝时期《史记》的传播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成就：

1. 节引《史记》

在《史记》还未得到广泛流传之前，有的学者就已经开始在自己的著作中节引《史记》。桓宽《盐铁论·毁学篇》云：“大夫曰：司马子言，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赵女不择丑好，郑姬不择远近，商人小丑耻辱，戎士不爱死力，士不在亲，事君不避其难，皆为利禄也。”这是节括《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一段议论，原文如下：

……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金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揄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阮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

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

桓宽记载御史大夫桑弘羊之言，事在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其时杨恽的正本尚未宣布，桑弘羊所见，当是存在京师的副本。退一步说，即使这段话不是桑弘羊当时之言，是桓宽加工润色的，也在宣帝时代。另外，《西域篇》文学谈大宛事，《刑德篇》御史大夫引韩非子事，《大论篇》文学谈孔子事，分别本于《史记》的《大宛列传》、《韩非子列传》、《孔子世家》。《盐铁论》是最早节括《史记》原文的著作。到了东汉灵帝时的张迁碑文，叙述张释之事，节括《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则是碑刻中节括《史记》原文的最早记录。

至于直接引用《史记》原文，则始于刘向。刘向当年点校经籍，每校完一种书，都著录书篇名称、介绍作者生平思想，写成叙录，后来把这些叙录汇集一起，叫作《别录》。今《别录》已亡，我们从严可均《全汉文》卷三十七可以看出，他撰《别录》时，引用过《史记》原文。《管子书录》全用《史记·管晏列传》管子部分，《孙卿子书录》节引《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韩非子书录》全录《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后来班固写《汉书》时，有四篇纪、六篇表、三篇书、四十篇传是在《史记》基础上写成的，其中有的是增补了一些材料，有的是就原有的材料另行编排组合，有的则是基本上照录原文。

以上各家的节括、引用，对《史记》的传播起了一定推动作用。

2. 引用《史记》注释古籍

《史记》在东汉后期得到广泛流传后，有些学者利用他来注释古籍，以资考证，高诱就是其中的一个。高诱，东汉灵帝、献帝时人，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东郡濮阳令。十七年迁监河东。他在注《吕氏春秋》、《战国策》时，多次引证《史记》作注。如《吕氏春秋·先识

览》谈晋太史屠黍之事，高注云：“屠黍：晋出公之太史也。出公，顷公之孙，宣公之子也。《史记》曰：‘智伯攻出公，出公奔齐，而道死焉，’”高引《史记》见《晋世家》。《战国策·西周策·秦召周君》条（本文用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篇名）：“或谓周君谓魏王曰：‘秦召周君，将以使攻魏之南阳。王何不出于河南？’”高注云：“魏王，《史记》作韩王。河南，《史记》作南阳。”《燕策一·人有恶苏秦于燕王者》条，苏秦曰：“信如尾生，期而不来，抱梁柱而死。”高注云：“《史记》：‘信如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柱而死。’”其他如《秦策二·陔山之事》条，《秦策三·范子因王稽入秦》条，《齐策一·楚威王战胜于徐州》条，《楚策一·苏秦为赵合纵说楚威王》条，《魏策三·秦败魏于华走芒卯而围大梁》条，等等，高诱在作注时都引用过《史记》，这给后人用《史记》作注、考证、校勘作了一个榜样。北魏酈道元给《水经》作注时，也引用过《史记》。如卷四《河水篇》：“陶渠水又东南经夏南故城，又历高阳宫北，又东南历司马子长墓北。……《太史公自序》曰：‘迁生于龙门’，是其坟墓所在矣。”人们用《史记》注释古籍，对扩大《史记》的影响起了很好的作用。

3. 择抄、删定《史记》

《史记》在没有广泛流传前，是极难得到的。统治者为了某种政治目的，有时抄出其中的几篇，赏赐给人。赏赐的篇目一般与本人的身份、功绩有一定的关系。《后汉书·窦融传》云：“（光武）帝深嘉美之，乃赐融以外属图及太史公《五宗（世家）》、《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窦融是窦广国的七世孙，五宗为景帝子十三人，皆窦太后之孙，魏其侯窦婴为窦太后之侄，所赐篇目都与窦家祖先历史有关。《后汉书·王景传》云：“又以尝修浚仪，功业有成，乃赐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及锦帛衣物。”王景是明帝时人，曾修建浚仪渠，在治水方面有一定成就，因此，皇帝赏赐他《史记》中的《河渠书》以示嘉奖。这些择抄的单卷，其流布范围仍然是很狭小的。

又据《后汉书·杨终传》，杨终曾“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杨终是汉章帝时人，他精通《春秋》，曾坐事入狱，经班固、贾逵等人上表请求才得貰出，参与白虎观论考五经之事。其删定的《史记》本，在汉以后的人，即未见过。陈直指出，“既受诏而删，所删的当然是不利于统治阶级的文字。全部《史记》五十二万多字，经他一删，几乎去了十分之七。”这种做法对传播《史记》未起到什么积极作用，但对后来的《史要》、《三史略》、《史汉集要》等史抄著作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4. 记载、宣传司马迁事迹

司马迁为完成《史记》，忍辱负重，坚韧不拔，给后人留下了光辉的形象。除了《史记》中的《自序》自述生平外，班固的《汉书·司马迁传》是在正史中第一次名正言顺地给司马迁立传，并全文收录了司马迁的《自序》和《报任安书》，这对传播《史记》、宣传司马迁的事迹起了积极的作用，使更多的人知晓司马迁，了解太史公传，班固的这一贡献是值得肯定的。虽然班固对司马迁颇有微辞，但对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求实精神则给予了充分的赞扬。正史之外，如《汉旧仪》、《博物志》、《西京杂记》等著作都对司马迁的事迹有或多或少的记载。

在宣传司马迁事迹方面还有一人值得提出，即司马迁祠墓的最早建造者殷济。《水经注》卷四记载，西晋怀帝永嘉四年（301年），“汉阳太守殷济瞻仰遗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树桓。”给死者立碑之事兴于东汉，后来历代统治者都下过禁令，晋武帝就曾下令说：“其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宋书·礼志》）殷济对司马迁及《史记》非常崇拜，以过人的胆识，不怕风险，给司马迁建立石室，立碑颂赞，使后人能瞻仰司马迁遗迹，确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

5. 史学的繁荣促使《史记》向更广的领域流布、渗透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繁荣局面，并成为独立学科，正史

得到独尊地位，原来《汉书·艺文志》中，史书列入《六艺略》的《春秋》类，著录西汉人著述仅六种，三百四十三卷。到了《隋书·经籍志》中的史部，分史部为十三类，著录正史即从《史记》开始，史书存亡合计八百六十七种，一万六千五百八十八卷。史籍数量、史学地位的巨大变化，正是学者竞相学习、仿效《史记》的直接结果，尤其是《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书的成功，反过来又加强了《史记》的影响。再以杂传为例，《隋志》著书二百一十七部，据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当时存亡合计有四百七十部，如《列女传》、《忠臣传》、《高士传》、《海内先贤传》、《名僧传》、《神仙传》、《四海耆旧传》等，史公列传的笔法已经渗透到了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

在这里需要一提的是梁武帝萧衍，他在史学上曾经有一个规模宏大的尝试，就是编撰上起三皇下至于梁的《通史》。《梁书·武帝纪》说，太清三年《通史》成，“帝造《通史》，躬制赞序，凡六百卷。”关于这部书的内容，《史通·六家篇》说：“梁武帝敕群臣上至太初下终齐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书至秦以上皆以《史记》为本，而别采他说，以广异闻。至两汉而还，则全录当时记传，而上下通达，臭味相依。又吴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跋氏列于夷狄传。大抵其体皆如《史记》，其所为异者，唯无表而已。”这是继司马迁以后的又一部中国通史，在史学史上实是一件大事。可惜的是参加编写的人史学、史才都比较平凡，写出的《通史》质量不高，加之刚一写出，就遇到侯景乱梁，这部书也遭厄运，不但没有得到政治上的支持，反而失掉了应有的重视，所以流传不广。但无论如何，《史记》对它的渗透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综上所述，《史记》在汉魏六朝时期的传播是走过了一段坎坷的道路。东汉中期以前，它只是在上层极小范围内流传，中期以后，逐渐得到较为广泛的流传。

二、补、续、辨、注《史记》

这是本时期《史记》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分别予以评述。

1. 褚少孙补《史记》

据《太史公自序》，《史记》全书共有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但传世不久就有残缺。《汉书·司马迁传》在全文引过《太史公自序》后接着说：“迁之自叙云尔，而十篇有录无书。”但所缺的究竟是哪十篇，班固并未具体说明。裴骃在《太史公自序》末注文中引三国时张晏的话：“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成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续，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此后，关于《史记》的缺篇补亡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对褚少孙，更是群起而攻之，“言辞鄙陋”、“非才妄续”的帽子一直戴在他的头上。

据典籍记载，西汉后期补续《史记》的多达十七家，但西汉时代真正补续《史记》的只有褚少孙一人（其余均为续写西汉史，详下），他以“褚先生曰”自称，以别于司马迁，所增补的内容在今本《史记》中皆低两格排列。那么，哪些是褚少孙所补的呢？历代辨析者众说纷纭。在这里我们只引述今人张大可的考证结果，以见褚少孙在当时的功绩。

张大可在《史记研究》一书中为了辨别《史记》的窜补，首先确定了《史记》的断限：“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是司马谈发凡起例的计划；“述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是司马迁的实际断限，附载大事则尽于武帝之末。以此为前提，作者对《史记》的残缺与补窜进行了缜密的考辨。就补窜而言，作者分褚少孙等续史、好事者补亡、读史者增窜、司马迁附记太初以后事四个项目，逐层论证。认为，褚少孙续补有明确标帜的计十篇：①《三代世表》；②《建元以来侯者年